

2001

南宁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南宁市永新区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第七辑

永新文史



2004

温 馨 的 回 忆

——中南海接见

周 孝 先

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1960年5月他们在中南海接见全国首届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代表，虽然也过去了整整40年，但当时接见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如昨天的事一样。那次幸福的接见使我终生不忘。

我从1957年起在南宁市盲人生产教养院负责领导工作，后来又调到南宁市负责盲人、聋哑人协会总干事工作，所以有幸出席参加1960年5月中央在首都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同我一起晋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有南宁市盲人代表两人、聋哑人代表一人，另外有自治区盲人协会副主任韦世祥（盲人、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在战争中致残）和百色地区聋哑人代表一人，也一起同行。在火车上，同车厢的乘客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见盲人、聋哑人都能上北京开会，觉

得很新鲜，对他们的新鲜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全国解放刚刚十年多，社会上对盲人、聋哑人的旧观念看法尚未全部解放。后来在火车上大家闲聊中，服务员知道韦世祥同志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并知道中央在北京召开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的重大意义，他们对我们的服务工作便做得很周到，随时送茶送水，开饭时间帮买好饭菜送到车厢。我们到达北京时，又帮扶盲人下车。会议筹备处早已派人在车站接待代表，我们是乘接待处的专车到西苑旅社住宿。

西苑旅社是会议代表的住地和会场（当时在北京它是比较高级的宾馆）。会议期间，还安排代表们参观北京的社会福利生产和盲人、聋哑人学校，参观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使代表们大开眼界，盲人以耳代目，也增加了不少新闻和知识。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大会秘书处传来激动人心的特大喜讯，说中央首长下午要接见全体代表，大家听后，欢欣鼓舞，午觉也不睡了，坐着等待接见时间的到来。下午，汽车分批把我们送到中南海，车停在新华门外，大家步行入中南海，在怀仁堂小体，等候代表到齐之后才列队进摄影场。摄影场的位置事先安排好，一排排固定的，大家按秩序坐的坐、站的站，前排中央座位留给首长。大家坐定不久，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总书记和谢老（觉哉）以及中央有关首长等一起进场，此时全场起立鼓掌欢声雷动，周总理、朱老总等首长们向我们挥手致意，由队伍前头行到

尾走一周，同代表们见面，然后坐到座位上，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照相完毕离场时，周总理、朱老总、邓总书记、谢老等中央首长同第一排的代表一一握手话别，此时全场再次鼓掌欢呼，送别中央首长，全体代表的心被这幸福的接见久久不能平静，终生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莫文骅将军和烈属的情谊

周 孝 先

莫文骅将军是南宁郊区（后改属江南区）亭子村人，他的学名叫莫万字六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莫老正在南宁的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他在学校参加共青团后，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全国范围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莫老是在5月4日上午在学校被捕的，后来关押在15军部的拘留所里（旧址在民生路原市人民政府礼堂处）。国民党反动派把被他们逮捕来的人员认为是“要犯”的都关押在这里。9月1日，被他们杀害的13位烈士（周仲武、雷天壮、雷沛涛、梁六度、罗如川、高孤雁、陈立亚、冯荫西、梁西园、张胆、莫大、梁砥、邓哲）便是关押在这里的，他们与莫老是同窗难友，所以莫老对13位烈士的子女情深谊重，关怀备至。1928年2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因无实据，莫老被“无罪释政”。获释后，他准备赴广州读大学，随兄弟班改名莫文骅，后因病留南宁养病，

1929年7月中旬考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因战事关系，10月随大队上百色，从此，正式参加革命武装部队。

莫老的部队是1949年12月4日解放南宁的主力部队之一。南宁解放后，成立军管会，莫老是军管会主任，后来是市长。国民党留下的旧南宁是一个烂摊子，当时的军管会百废待兴，工作繁忙艰巨，但作为主任的莫老仍念念不忘13位烈士的家属，想方设法查访、调查登记，生活困难的即给予救济，有工作能力的，即安排工作。根据烈士牺牲时的工作职别，发放优抚金。1950年春节，组织慰问队敲锣打鼓向烈属送“光荣之家”匾牌、挂大红灯笼和送慰问礼物，并在民生路金山大酒店（今青云街口斯壮通讯公司）设宴请烈属聚餐。平时时，莫老常分别邀请烈属到他家中作客，问寒问暖拉家常。雷开、雷成兄弟俩（雷天壮烈士儿子）、雷荣恩（雷沛涛烈士儿子）、陈炳夷（陈立亚烈士儿子）、周孝先（周仲武烈士儿子）等人均先后多次到莫府作客。1950年9月1日，由市人民政府在民生路同乐戏院（从前关押革命人士的15军部拘留所后来的市人民政府礼堂）召开1927年9月1日牺牲的13烈士纪念追悼大会，莫老和省市党政军领导、烈士家属均到会参加行礼。

1951年春节过后，莫老提议将北门外“望仙坡”辟建人民公园，为了纪念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在

“镇宁炮台”后面山顶建一座临时性的烈士公墓，并在1951年清明节前落成使用。古炮台山脚下是旧社会国民党的杀人刑场，1927年9月1日13烈士和以后两批被杀害的烈士就是在这里就义的。后来永久性的烈士纪念碑建成，烈士公墓才拆毁。1980年莫老向南宁市政府建议，在高矗的纪念碑对下广场，增建烈士芳名录的纪念碑一座，使烈士流芳百世。莫老因此写下一首纪念诗：“触目惊心作楚囚，惨如地狱逼人愁。敢抗横流称直士，要翻逆势作耕牛。对月吟哦诗泣血，号天反害布塞喉。烈士刑场歌慷慨，同俦脱险灭敌仇”。（见莫文骅回忆录24页）

因工作关系，1951年5月，莫老奉中央令调至东北工作，他人虽然高开了南宁，但仍时常关怀我们这些烈属，因事回南宁，均邀我们到他下榻的地方叙谈拉家常。他编著的《百色风暴》、《廿年打个来回》、《莫文骅回忆录》三本书均亲自签名赠给我们留念。在颠倒黑白的十年“文革”中，他被诬陷为“叛徒”，部队组织按莫老提供的线索，派了三个解放军由北京来南宁向烈士遗属外调要材料，当向我问及莫老“4·12”被捕又被释放的问题时，我实事求是照老辈人说的莫老当时得以释放的原因，写证明他不是叛徒的材料给外调的解放军，从这事可见莫老对13烈士家属的信任。1997年春节前，他回北海、百色旅游观光，后他和夫人杨枫回南宁探亲，下榻两园饭店，在回北京的前一日，由他外甥女

用小车接我和陈炳夷同志到西园叙旧并照相留念。



1997年1月19日莫文骅将军（左二）、夫人杨枫（左一），看望烈士之子周孝先（右一）、陈炳夷（右二）时合影。

渣滓洞大屠杀时 冲出牢室者为何大多未能脱险

何 小 渝

1949年11月27日，溃逃前的敌特，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里的200多名共产党人、革命者实施了集体大屠杀。当时虽有32人冲出了牢室，但脱险的却只有15人，冲出牢室者为何大多不能脱险？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史料中尚未有详尽的说明。

“红岩”是我党、我国现代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作为“重庆市红岩史料研究会”的一名会员，经过调研和实地考证，有责任将自己对这一情况的研究，告诉社会告诉群众。

当年，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杀害囚禁的革命者是敌特的一项重要计划。为此，敌特作了周密的安排；如在什么地方屠杀，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武器，挖什么样规格的掩埋尸坑，行刑人员的编配及后勤保障等，都有完整的方

案。

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神速，使敌人来不及按原计划分批提杀，而临时将全部牢室的人员集中到地下 10 间牢室内实施射杀。由于牢室轩子门的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射击死角，（本人实地测算后认为：射杀时刽子手的枪管左右方向只可摆动 40 度，大于 40 度外，枪弹难以击到），敌特在射击时是靠手电筒、探照灯的照明，光源很不够，影响了射击准确度。尽管敌特正而扫射后又转到后窗扫射及入室补枪，但由于行刑敌特是几个单位临时组合的，在我军兵临重庆，进攻的隆隆炮声已使敌特忧心如焚，他们的组织和指挥已松垮，山倒兵败，谁都想先逃命，有几个愿意去一一翻尸补枪？因此还是有少数同志没有牺牲，他们被中弹倒下的同志盖挡着而幸存下来。

渣滓洞牢室的门是用方木条制作的，我考察了按原样复制的牢门，其强度并不很牢固，几人合力是能扳开的。敌人不加固门，是因为他们认为对革命者的防范和威慑，主要靠狱外的 9 个岗亭和巡逻队。此情况是前中美所渣滓洞少尉黄茂才先生在我实地考察时告诉我的，这样，幸存的同志就能扳开门冲出牢房。

史料记载，敌特行凶纵火后，就退到离牢室外台阶一带的空坝处集结，此处离牢室有近百米，这说明他们认为已没幸存者了。当冲出的同志暴露在火先里时，他们才发现，忙用没有依托的立姿、跪姿射击法朝突围着

射击，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部份敌特所处的位置，被房檐遮挡，没被击中的同志才冲到了危墙前并合力推倒它得以跳出脱险。

围墙缺口处距最远的牢室约有 34 米，狭窄又受烈火烧烤的牢室走廊，影响了突围者的奔跑速度，也极易失足从约 2 米高的走廊上摔跌到院坝下。我分析了当年在此处拍的史料照片，冲出牢室又牺牲了的同志，几乎都躺在靠近院坝下，者来是受伤或中弹摔下后无法爬上走廊向外突围而被包围上来的敌特杀害。枪弹封锁最严密的就是靠围墙的那几米距离，罪恶的烈火又为敌人映照了目标，很多同志就牺牲在那里。脱险志士刘德彬、盛国玉等同志，对我谈了当时那惊心动魄的情况。

刘德彬：“我在室内受伤后被浓烟呛醒，与虽负了伤但还活着的难友杨培基、林涛、周仁极共同扳断了木条门，飞也似的冲到有缺口的围墙前，我站在杨培基的肩上，把缺口推大，跳出后沿着渣滓洞外的小溪沟突围。很多同志却倒在弹雨中……”

盛国玉：“特务们发现我们从牢室内冲出后，几乎同时开枪，打完子弹又同时换装子弹，被火力压倒在地上的同志，听到敌人拍打弹匣的‘啪啪’声响，知道是在换装子弹，果断的同志就起身冲出缺口得以脱险，但很多同志没把握好这个时机，还继续卧地，待敌人发起冲锋堵住围墙后没法脱险而全部牺牲。”他们还告诉我：“幸而敌人的警卫连和狼狗已撤离，雨夜的歌乐山群掩

护了逃出的同志，敌特只能干着急，如在白天，情况就难以想象了。”还有一个情况要说的是：当敌特的机枪疯狂扫向牢房时，我的父亲何雪松及胡作霖、张学云同志，勇敢地扑向风门，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吸引了火力，掩护了难友后撤和争得到了宝贵的时间。

对冲出牢室而又壮烈牺牲的那 17 名同志当时的更多情况，由于行刑敌特徐贵林、赵正清解放初被我军镇压，徐中兴病亡，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王少山等已由徐远举送逃台湾，有的敌特失踪，那段更多的悲壮历史，现没法考证，文章也就只好暂写到此。

渣滓洞的歌声

——囚歌《把牢底坐穿》的诞生

何 丹 妮

《把牢底坐穿》是人们熟悉的一支歌，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自1950年1月，重庆举行“杨虎城将军暨死难烈士追悼会”后，这首歌即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一直将此歌作为标志性的烈士遗作高悬在馆内醒目位置。六十年代，此歌曾被编入小学教科书，许多报刊杂志也相继刊载。后随着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话剧《红岩》等文艺作品的不断问世，这首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首半个世纪以来激励几代人的囚歌的真正词、曲作者，我竟不知道是我的父亲何雪松和周特生叔叔。前不久我因收集父亲的生平事迹，在南京见到了仍然健在的周特生老前辈，他向我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1946年，已从抗日的战场辗转返回山城重庆的我

的父亲何雪松，以其时任国民党 203 师政治部第五军官总队上校教官兼《五总》月刊总编辑的公开身份，为迎接解放大军入川，根据党的指示，与地下党的同志们秘密组织武装斗争。1947 年秋，正当他奔忙于沟通渠县与南充之间的联系，并在那里设一商店作地下活动中心，筹集武器时，被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父亲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逼供，但他始终坚强不屈，最后被押往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长期囚禁。父亲那坚毅不屈、正直、乐观而健谈的品性，很快便与首批关进渣滓洞的周特生等人结成了患难之交。

周特生原名周世楷，原为戏剧工作者（实为我党秘密党员）。捕前先后担任重庆《民主报》经理和新中国剧社社长。曾组织首演陈白尘编的大型讽刺话剧《升官图》，轰动了山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于 1947 年 5 月 31 日，与一同被捕的二、三十人，经过校长时间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乃于同年的冬天，将他们全部囚禁渣滓洞监狱。周被关在楼下二号牢房，我父亲则关在楼上五号牢房。

在狱中，我父亲和周特生与狱中革命志士楼上楼下暗中串联，与敌特展开了隐蔽、机智、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们通过三天绝食斗争，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改善伙食，一日两餐，一顿米饭和一勺黄豆汤；增加放风时间和活动空间；允许唱歌、唱京戏和在院坝打球。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渣滓洞狱中最普遍、最有凝聚力的活动是唱革命歌曲，往往一室引唱，其他各室随之唱和，歌声从楼下传到楼上，声音也越来越激昂、豪壮。他们唱的《正气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起到了相互感染、激励斗志的作用，往往使敌人既恼怒震惊，又无可奈何。

随着形势的日趋严峻，许建业、江姐等一些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也相继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牢房。江姐多次遭到敌特严刑逼供依然坚贞不屈。许建业也因宁死不屈被敌人枪杀……眼看着自己的同志遭酷刑、被杀害，我的父亲怒不可遏，为正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熊熊烈火在他的胸中猛烈燃烧。他酝酿着，挥动起他那浸血凝恨的笔……

一次放风时，我的父亲佯装与周特生聊天，趁人不注意时，迅速将一个很小的纸团塞到周的手中，并小声叮嘱：“世楷，这是我写的一首诗，请务必替我谱上曲。”说完紧握了一下周的手。周回到牢房后，立即轻轻地展开字条，于是一首遒劲、悲壮醒目的歌词映入眼帘：“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周特生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周早年在四川省立戏剧音乐专科学校就读时，即对音乐创作产生了兴趣，并显示了才华。他感到我父亲在黑牢中写下的《把牢底坐穿》一诗，代表了狱中共产党人为正义事业不屈不挠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心声。于是，周决心要将曲子谱

出来，供同志们在狱中传唱。

然而在狱中写诗作曲都是敌人所不允许的。为了不使敌人察觉，周在心中反复构思，并将初稿写在草纸上。深夜，当他的灵感来了，使用手轻轻地敲击着床沿打着节拍，眼睛望着黑洞洞的铁窗，低声试吟着，心潮激昂而澎湃。这旋律深沉凝重而高昂，他将他的心声，他的情感完全融进那悲壮的歌声中去。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推敲，几经修改，一曲革命者用意志和心血凝成的囚歌《把牢底坐穿》终于在渣滓洞牢房诞生了。曲子谱好后，借放风的机会，周将词曲一起悄悄地交给了我父亲。父亲看后更是激情难抑。为防特务搜查，他们将歌曲反复背诵熟记后，便将稿子撕毁扔进了粪池。之后他们利用放风，偷偷地传唱这支歌。

一天黄昏，忽然一间牢房响起了这凝重深沉的歌声：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

紧接着接上楼下各间牢房也都跟着唱了起来：

“这是个动乱的日子，
寒夜被人硬叫着白天。
在人们的头上，
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

据说天不应该被人呼唤，

而他的位置是在他们的脚底下面。

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么，

为什么大众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铿锵有力的歌声汇聚在一起，此起彼合，似一股巨大的时代洪流，直冲向黑沉沉的夜空，震撼着摇摇欲坠的渣滓洞牢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灯翻！

今天，我们是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希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歌声把数人震惊了，令刽子手们惶恐了，他们立即对渣滓洞进行了全面追查，扬言一定要查出作者，从严惩办。但最终竟是一无所获，不得不草草收场。

当年在渣滓洞囚牢里，我们的共产党人，我们的诗人和作曲家，就是以“把牢底坐穿”的反抗者的歌声，向残暴的敌人进行公开的声讨、斗争的。

1949年11月27日，敌人在溃逃前对渣滓洞被监